

# 宗炳终身不仕考述

——兼评“宗炳出任论”

黄发玉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28)

**[摘要]** 宗炳, 南朝刘宋人, 画家、书法家、佛学思想家、山水画论鼻祖, 对中国绘画艺术和中国美学的发展、对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宗家是当时荆州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其祖父、父亲和兄长都曾在东晋地方为官, 宗炳有优越条件和众多机会出仕为官, 但其一生视轩冕如秋草, 徜徉于山水之间, 潜心于佛道修持, 隐居于江陵、庐山和衡山等处,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代表人物。正史明载宗炳先后九次被朝廷和地方征召, 且其征召的官职和品级越来越高, 但他始终拒官不就, 体现了一个真隐士独立不迁、超然脱俗的高洁品格, 最终成为古代文人学士所崇拜和追慕的艺术楷模和精神偶像。史上偶有称谓宗炳官职的记载, 有学者误读为宗炳曾从命出仕, 这种误读所得出的结论改变了宗炳的历史形象, 也对正确认识宗炳的历史贡献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误读的原因主要是对东晋南朝时期官府授官与士人受官的制度程序缺乏正确的理解, 同时还与考证不周、史实混淆有一定的关系。本文较为详细地考述了宗炳每一次征召不就的史实, 分析了误读宗炳的主客观原因, 对“宗炳出任论”作出了回应。

**[关键词]** 宗炳 隐士 征召 不仕 出仕 山水画论 佛教

**[中图分类号]** J21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2)04-0142-08

南朝刘宋隐士宗炳(375—443), 字少文, 祖籍南阳, 生于江陵, 中国古代著名书画家、佛学思想家、山水画论鼻祖。宗炳生平主要见于《宋书》《南史》, 二书均将宗炳列入隐逸传。从仕与隐的关系来划分, 隐士具有不同的类型, 有半仕半隐、名隐实官、隐而后仕、仕而后隐、完全归隐等。不管怎样分类, 宗炳都是彻底的隐士。他的隐居, 不是以隐求仕、也不是退官而隐, 而是始终如一, 独立不迁, 多次征召不就。宗炳终身不仕, 这本是千古不易的结论。但有学者发文, 认为宗炳至少为官两次。<sup>[1-2]</sup>这对以往公认的定论形成了冲击, 也改变了宗炳

的历史形象。本文试对此问题略加考述, 以回应“宗炳出任论”, 并求教于学界。

## 一、九次征召而不应

细研史籍, 不难发现宗炳一生至少九次征召而不应, 其中八次为《宋书》本传所载, 《南史》本传(除重复外)另载一次。

第一次: “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 举秀才, 不就。”<sup>[3](P2502)</sup>(以下引《宋书·宗炳传》, 不再加注。)

既然是“并辟”, 就应该是二人同时主政

收稿日期: 2021-11-20; 修回日期: 2022-03-21

作者简介: 黄发玉, 宗炳故里学者,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美学及文化问题研究。

并会商。殷仲堪，东晋士族，太元十七年（392年）十一月“为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sup>[4](P239)</sup>；桓玄，东晋权臣桓温庶子，曾篡位称帝，建立桓楚。而此时桓玄已袭爵南郡公，弃官回荆州，“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殷仲堪对桓玄有所忌惮，纵容有加。隆安二年（398年），桓玄因王国宝事始得志，为江州刺史；隆安三年（399年）“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sup>[5](P252)</sup>次年，玄都督荆司雍等七州，领荆州刺史。<sup>[6](P2588-2589)</sup>可见，“并辟”之事当在隆安二年与三年（398—399年）之间，考虑到隆安二年，殷、桓二人关系尚未破裂，而隆安三年则已完全破裂直至十二月殷被桓所杀，故“并辟”之事很可能发生于隆安二年（398年），是年宗炳24岁。

第二次：“高祖（刘裕）召为太尉参军，不就。”义熙七年（411年），刘裕被授太尉，中书监。“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sup>[7](P29-30)</sup>可见，刘裕被授太尉后，有召募、选拔人才之举，征宗炳为太尉参军当在此时，是年宗炳37岁。

第三次：“高祖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纳之，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高祖善其对。”

义熙八年（412年）九月，刘裕自表讨毅。十月，参军王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刘裕）至江陵。”至次年二月，刘裕在江陵停留三个月。<sup>[7](P30)</sup>期间，刘裕即着手行政和人事调整，分荆州十郡为湘州，并不计前嫌，征辟跟随刘毅八年之久、并任刘毅卫军从事中郎的谢灵运为太尉参军。辟宗炳为主簿当在此时，以义熙八年（412年）计，宗炳38岁。

第四次：“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并不就。”<sup>[8](P1860)</sup>刘道怜为刘裕异母弟，向为刘裕所重。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复以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平西将军，领护南蛮校

尉，荆州刺史，假节。休之在江陵颇得民心，刘裕“疑其有异志”，<sup>[7](P33)</sup>义熙十一年（415年）正月，借故赐死休之子侄。四月，击败司马休之，攻克江陵，授刘道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护南蛮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sup>[9](P1594)</sup>因此道怜最早于义熙十一年（415年）召辟宗炳。时宗炳41岁。

第五次“高祖开府辟召，下书曰：‘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兔置》潜处，《考盘》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于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

据《宋书·周续之传》载：高祖将北伐，江州刺史刘柳荐之高祖曰：“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加以仁心内发，义怀外亮，留爱昆卉，诚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缉。”“俄而辟为太尉掾，不就。”<sup>[10](P2505)</sup>义熙十二年（416年）正月，“诏公（刘裕）依旧辟士。”“于是始辟召掾属。”<sup>[5](P145)</sup>由上可知，宗炳、周续之二人同时征召于义熙十二年，是年刘裕北伐，宗炳42岁。

第六次：“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不应）宋受禅即刘裕称帝，刘宋建国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是年八月“立王太子为皇太子”，<sup>[11](P59)</sup>其时宗炳46岁。

第七次：“元嘉初，又征通直郎。”（不应）“太祖元嘉二年（425年），诏曰：‘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革，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颙可国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sup>[12](P2500)</sup>是年，宗炳51岁。

第八次：“东宫建，征为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应。”元嘉六年（429年）三月“（文帝）立皇子邵为皇太子”，<sup>[13](P84)</sup>征召宗炳，当在元嘉六年及之后。

元嘉九年（432年），朝廷“诏内外百官举才”，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上表推荐宗炳，其表曰：“窃见南阳宗炳，操履闲远，思业真纯，砥节

丘园，息宾盛世，贫约而苦，内无改情，轩冕屡招，确尔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伦之美，庶投竿释褐，翻然来仪，必能毗燮九官，宣赞百揆。”<sup>[14](P1795)</sup>

三年后的元嘉十二年(435年)五月，“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著《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sup>[15](P714)</sup>既然此时已被称为“太子中舍人”，可见征召最晚于元嘉十二年(435年)之前。若因刘义恭举荐，宗炳被征召“太子中舍人，庶子”，应在元嘉九年(432年)，时宗炳58岁。

第九次：“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元嘉十六年(439年)，义季代临川王义庆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季主荆州后，也有辟士之举<sup>[16](P2510)</sup>，宗炳被征召当在此时。义季“亲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见不拜。王曰：屈先生以重禄，可乎？对曰：‘禄如腐草，衰盛几何。’”<sup>[17](P347)</sup>以元嘉十六年(439)计，宗炳65岁。

上述九次征召，简而言之，殷仲堪、桓玄主荆州时一次(主簿、秀才)；刘裕主政时五次，其中受命太尉后辟为参军、诛刘毅后辟主簿、北伐前后辟太尉掾，弟道怜主荆州辟记室参军、宋受禅后召为太子舍人；文帝刘义隆主政时三次，其中元嘉初征通直郎，东宫建征太子中舍人、庶人，弟义季主荆州时征咨议参军。

需要说明的是，《宋书》本传对宗炳征召的记载(前半段)，并非按历史顺序。“高祖诛刘毅后辟主簿”这一事件叙述完后有一段文字，用以说明宗炳的“栖丘饮谷，三十余年”：

“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也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

王敬弘与宗炳出游的时间系王任征西长史

(王敬弘传中为“安西长史”)、南平太守期间，《宋书》载：王敬弘“少有清尚，……性恬静，乐山水”“敬弘至巴陵，……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sup>[18](P1893)</sup>安西长史为安西将军的下属，王敬弘任长史时安西将军治所为江陵。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之兄桓伟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南蛮校尉。元兴二年(403年)九月或稍前，桓伟卒，王敬弘乃弃官闲居。是年桓玄篡晋，次年桓玄兵败。可见，王敬弘转为桓伟安西长史的时间在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或稍后，至二年(403年)九月或稍后，此时为王、宗同时出游时间。

尔后宗炳“乃下入庐山”，并为兄所逼回，在三湖立宅，闲居无事。其间高祖受命为太尉(411年)，召宗炳为参军。至义熙八年(412)年，刘裕诛刘毅后再次召宗炳为主簿时，宗炳已三十余岁，故有“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之语。

宗炳一生屡次征召而不就，史有明载。《宋史》本传以六个“不就”或“(皆)不起”“(并)不应”回应八次征召。《南史》对其唯一增加的一次(“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也记为“并不就”，并一言以蔽之曰：“宋受禅及元嘉中频征，并不应。”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和宋陈舜俞撰《庐山记》等重要佛教史籍关于宗炳的生平中，均明确记载多次征召而不就。<sup>[19-20]</sup>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宋文》(卷二十)“宗炳”条目在列举《宋书》中的八次征召后，也以“皆不就”结尾。<sup>[21]</sup>总而言之，考诸史籍，并未发现宗炳有任何出仕之举。

宗家是当时荆州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其先祖曾助力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称帝，宗炳祖父宗承封柴桑县侯、任宜都太守，父亲宗鲙之为湘乡县令，兄宗臧为南平太守。宗炳有优越条件和众多机会出仕为官，但他却志托丘园，久而不渝，视官禄如秋草，屡次拒官不就，体现了一个真隐士超然脱俗、自由飘逸的高洁品格，最终成为古代文人学士所崇拜和追慕的艺术楷模和精

神偶像。

## 二、“出世论”者之误读

韦宾先生对宗炳思想做过一些研究，对宗炳生平做过一些考证，值得赞许。但其某些结论，特别是关于宗炳出仕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苟同。

韦文认为，宗炳至少出仕为官两次，第一次是出任主簿。

韦文说：“《本传》中的‘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一语当断为‘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因此韦文认为宗炳已任桓玄与殷仲堪之主簿，只是未应秀才之举。同时韦文又认为高祖诛刘毅后，宗炳应召就任高祖之主簿，“其时宗炳当为三十七八岁。时宗炳已任桓玄与殷仲堪，或刘裕所辟之主簿职。”

如果说关于出任殷仲堪、桓玄主簿之职，韦文的断句还勉强有点“理由”的话；那么关于出任刘裕主簿之职的结论，则完全不顾史实。

《宋书》明载：高祖诛刘毅后，“辟炳为主簿，不起”。韦文也引用了此语，但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又断然否定，实在令人不解。

韦文认为，宗炳第二次为官是出任“太子舍人”。

韦文引用《宋书·戴颙传》中太祖元嘉二年（425年）诏：“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萃，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颙可国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韦文按曰：“‘新除’者，当即戴、宗已就其职，前‘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即此也。”认为宗炳在元嘉十二年（435年）作《明佛论》时，“可能（已）就任太子舍人一职，此前亦可能就主簿之职。”

诏书所说的“丘园”即指隐居之处；“衡萃”即横木编萃以为门户，喻简陋的房屋，借指平民和隐士的居所。“恬静之操，久而不渝”则表明宗炳至元嘉二年（425年，51岁）久征不就的事实。

简言之，在韦文看来，宗炳自隆安三年（399年）起任殷仲堪、桓玄之主簿（接着或任刘裕之主簿），宋受禅（420年）开始又任太子舍人，至435年，即宗炳至少连续35年任职。如果是这样，宗炳就已经不是一个隐士了，史籍将其归入隐逸类就不恰当了。

仔细研读韦文，笔者觉得其考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考证不周。**《宋史》《南史》记载宗炳九次被征召，但韦文仅涉及八次。即：1、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2、高祖辟为主簿；3-4、辟为太尉参军、太尉掾；5、征为太子舍人；6、征通直郎；7、征为太子中舍人、庶子；8、命为咨议参军。此八次均为《宋书》所载，《南史》记载的“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则未提及。

**二是史实混淆。**其一，高祖辟宗炳“太尉参军”和“太尉掾”，本为两次事件，所涉官职有所不同，时间也不同，且《宋书》本传系分开记载。第一次（辟太尉参军）是在411年，即刘裕任太尉之后，“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第二次（辟太尉掾）系与周续之同时，即刘裕北伐之年（416年），“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辟太尉掾，皆不起。”但韦文却将二者作为一次征召：“则辟宗炳太尉参军、太尉掾，在义熙七年前后，即411年前后，时宗炳三十七岁左右。”其二，宗炳征召为“太子舍人”和“太子中舍人，庶人”，也是两次事件，官职不同，时间不同，俸禄也不同，《宋书》也是分别列出。一为“宋受禅”，即宋国成立时（420年），征为“太子舍人”；一为元嘉六年（429年）三月“（文帝）立皇子邵为皇太子”后，征“太子中舍人，庶人”。且其间宗炳还另有一次征召通直郎不就，而韦文又将两次征召太子官属混在一起。

韦文据此认为：“则宗炳未就通直郎等职，然直至元嘉十二年，宗炳亦为称之‘太子舍人’者，即宗炳在其职已十余年。”

首先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宋书》本传在列举“太子舍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庶人”

这三次征召后，以“并不应”结尾。同时韦文也混淆了相似的职位。前引何尚文中的“太子中舍人”，系宗炳被征召的“太子中舍人，庶人”（系文帝所辟）的简称，与“太子舍人”（系武帝所辟）在职位、品位上是有区别的（详后）。

三是张冠李戴。《宋书》宗炳本传中插有一段文字：“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接着，本传继续记述宗炳生平：

“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衡阳王义季与司徒江夏王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终始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已。’”

针对这一段文字，韦文写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江夏王义恭尝荐炳于宰相，前后辟召，竟不就’，可能与史实不合。”“刘宋时期，宗炳老疾俱至还江陵，所受征召，恐怕指的就是宗炳本传所谓‘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但从《南史》师觉授传来看，这指的是师觉授不应召辟，并非指宗炳，且《宋书》谓召师觉授者为义季，《南史》谓义庆，但与义恭无关。‘并不就’乃指祭酒、主簿二职皆不就。就事件本身来讲，师觉授传所讲的征辟与《历代名画记》宗炳传所讲的征辟应属同一件事，巧合的可能性很小。《历代名画记》谓刘义恭前后召辟，恐怕是张彦远误读了《宋书·宗炳传》的意思，并且有意将‘临川王义庆’改为‘江夏王义恭’，且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窜改成‘前后辟召，竟不就’，以为宗炳一生皆未出仕，实在是一种误解。”

韦文显然存在人物的混淆和史实的错乱。

其一，张彦远的“江夏王义恭尝荐炳”，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前述宗炳第八次征召时，已引义恭元嘉九年（432年）上表荐炳云云，即张彦远所言之事。元嘉六年（429年）至八年（431年），江夏王义恭曾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任荆州刺史，镇江陵，且时任义恭抚军长史、持军、南蛮校尉的张邵曾派儿子张敷求教宗炳，可见义恭对宗炳多有耳闻甚至交

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只是对《宋书·宗炳传》的转述。

其二，韦文说：“《宋书》谓召师觉授者为义季，《南史》谓义庆，但与义恭无关。”实际上无论是《宋书·宗炳传》，还是《南史·师觉授传》，均记载“义庆”而非“义季”或“义恭”辟召或表荐师觉授。除本传外，师觉授生平还另有记载：“元嘉十二年，普使内外群官举士，义庆上表曰：‘……处士南阳师觉授，才学明敏，操介清修，业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为州祭酒，未污其虑。若朝命远暨，玉帛遐臻，异人间出，何远之有。’”<sup>[22](P1609)</sup>可见，义庆多次辟召或推荐师氏，并无征召或举荐宗炳。

其三，韦文说：“师觉授传所讲的征辟与《历代名画记》宗炳传所讲的征辟应属同一件事。”实际上并非同一件事，而是韦氏混淆师觉授和宗炳二人征召史实。《宋书·宗炳传》的“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这段话，明明白白写的是“师觉授”，而江夏王义恭也确实举荐过宗炳。

所以《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并不存在所谓的“误读”，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窜改”。因此，所谓宗炳多次出仕，没有任何证据，也不存在“历史的误解”。真正“误读”“窜改”的，只能是韦宾先生本人。此外，韦宾先生在考述的过程中，多有主观臆断之处，如认为宗炳本传中的“慧坚”可能是“慧远”，王敬弘本传的“宗协”可能是“宗炳”，如此等等，都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加之对史籍中“新除”一语的理解错误（详后），其结论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 三、朝廷征召与士人不应

尽管宗炳终身不仕，但是在可见史籍中确有称宗炳官职的记载，这可能是宗炳被“误读”的重要原因。

原因一是前引刘宋何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文云：“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

人宗炳，信法者也。”<sup>[15](P713)</sup>

原因二是梁庾元威《论书》云：“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sup>[23](P59)</sup>

原因三是乾隆《江陵县志》云：宗炳官太子中舍人。<sup>①</sup>

宗炳从来没有应召，但对其征召的职位和品位却不断上升：

第一、三次，召为主簿。主簿，即主官属下佐吏，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或秘书长。古代官府皆有主簿一职，上自三公，下至郡县，故其品位不一。魏、晋以下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主簿常参机要，总领府事。隋、唐以前，因为长官的亲吏，主簿权势颇重。

第二次，召为太尉参军。太尉本为“三公”之一，乃朝廷最高军政长官（但有时仅为官衔而非官职）。参军，原为“参谋军事”，后军府以外官署亦置，宋时诸府参军为七品。

第四次，召为记室参军。记室系掌管文书之官职，记室参军即专事掌管军队文书工作的官职，亦应为七品。

第五次，召为太尉掾。太尉掾，即太尉副官或一曹（即部门）之长，总领曹事，宋时公府掾、属为七品。

第六次，召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为太子官署，陪伴太子，以其品行影响太子，各个朝代品位不同，宋时太子舍人定为七品，品位较低。

第七次，召为通直散骑侍郎。散骑侍郎，掌文学侍从、收纳章奏、劝谏纠劾的官职，东晋时置二人，后增至四人，属散骑省。通直散骑侍郎，职同散骑侍郎，参平尚书奏事，兼掌侍从、讽谏，地位较高。员外散骑侍郎与散骑侍郎通员当值，故曰通直。宋时为五品。

第八次，召为太子中舍人、庶子。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为太子官属。宋承晋制，各置四人，共掌文翰，中舍人在中庶子之下，但其俸禄相同。宋时太子中庶子，庶子，均为五品。

第九次，召为咨议参军。咨议参军即咨询谋

议参军，属顾问谏议官职，王府和州府所设特别官职，职数不定，地位甚尊，位于一般参军之上，有时行大郡太守甚至州府长官之职。宋时“刺史不领兵者、郡国太守、内史”为五品，“咨议参军”应不低于五品。<sup>[24-25]</sup>

拒召不就，但仍能以其征召官职称谓，而且其品位越来越高，这在中古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皇权与士人之间一种特殊的权力与品望关系。据《后汉书》载，当时的隐逸之士频受朝廷之征辟礼遇，东汉王朝对隐逸之士采取十分开明的态度，而“士人高自标置不肯‘屈身降志’，王朝政府却须反躬自责为德薄不能致贤。”<sup>[26](P86)</sup>

一方面，征召是官方将社会贤达纳入其统治框架的一种手段，或者是表明唯才是举的一种姿态。正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sup>[27](P1754)</sup>但另一方面，“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sup>[28](P3627)</sup>的权利。士人可以应召，也可以不应召。虽然没有应召，这些士人却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官职或品位）。随着辟命官职或品位的提升，被召士人的声望也随之上升。<sup>[29](P203-206)</sup>当然，对于不应召者，则可能有违抗君命之嫌，面临着追究过失的风险。<sup>[29](P224)</sup>

尽管士人多次征召不就，朝廷及长官仍然“乐此不疲”。甚至以上一次征召的官职来称谓未曾任职的士人，如魏文帝曾诏命管宁为“太中大夫”，尽管管宁未曾就任，魏明帝仍在诏书中称其为“太中大夫”，实际上是“未曾受其位，亦可获其号。”“征命所任官职已经附着于管宁的个人身份之中，而无关其应命与否。”“事实上，对宗炳所称的‘太子舍人’，亦具有同样的性质。”<sup>[29](P251, 254)</sup>

从东汉后期始，官方把这种征召不就的官职品位作为下一次征召的起点。与宗炳同时的戴颙，就先后征召为太尉行参军（七品）——通直散骑侍郎（五品）——国子博士（六品）——太子中庶子（五品）——散骑常侍（三品）。“虽

①见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十八杂记[Z]. 原版复印本，第27页。

然戴颙从未真正接受过王朝的任何一次征除，但王朝在对于戴颙的征召中所任官职，……升进路径，皆与王朝正常的权力秩序无异。”<sup>[29](P254)</sup>宗炳也是如此，前引“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表明朝廷也曾任命宗炳为“太子舍人”，宗炳并未接受即并未就职，但朝廷仍以“太子舍人”为征召的起点，任命宗炳为“通直散骑侍郎”，征召的官职品位比上次高。

南朝史籍所提及的‘新除’事例，均有‘未拜’之义。前述韦文对“新除”的理解，与实义正好相反。“新除”并不表明某人“已就其职”，只是尚未上任的新职。“除”与“拜”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两个端点，从“除”到“拜”，即从朝廷授官到个人受官，有着特定的制度程序。通俗地说，“除”相当于今天的“任命”（“新除”也就是“上次任命”之义），“拜”相当于今天的“就职”。<sup>[30](P118, 122)</sup>这样的记述屡见不鲜，试举几例：

殷仲堪：“除尚书郎，不拜。”<sup>[31](P2193)</sup>

雷次宗：“除给事中，不就。”“（元嘉）二十五年，诏曰：‘前新除给事中雷次宗，笃尚希古，经行明修，自绝招命，守志隐约。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骑侍郎。’”<sup>[32](P2518)</sup>

王敬弘：元嘉六年四月“迁尚书令，敬弘固让（推辞不就）”，<sup>[33](P1894)</sup>五月“以新除尚书令王敬弘为特进、左光禄大夫。”<sup>[34](P84)</sup>

不管士人有没有接受皇帝或官府的征召，在官方看来，这种征召具有权威性，“朝廷对官职的除而未拜，也在官资层面给予法理确认。”<sup>[30](P138)</sup>因此无论应命还是拒绝，征召的官职已成为士人身份的一部分。宗炳虽然一生未曾应召，但其征召的品位却在不断提高，史籍中也偶现宗炳官职的记载，其原因也在于此。

宗炳终身隐逸不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家庭成员。史载：宗炳从父弟宗彧之，“蚤孤，事兄恭谨，虽文义不逮炳，而真澹过之。”朝廷及地方政府曾先后辟主簿，举秀才，征为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他都未曾应召。<sup>[35](P2515)</sup>宗炳外弟师觉授，已如前所述，多

次征召而不就。<sup>[36](P1806)</sup>宗炳孙宗测，“亦有祖风”，州举秀才、主簿，骠骑豫章王征为参军，永明三年（485年）诏征太子舍人，建武二年（495年）征为司徒主簿，皆不就。<sup>[37](P1806)</sup>可见，宗炳同辈与晚辈中多人隐逸不仕，体现了宗炳高洁的家风和处世的品格。这也同时说明，多次征召而不应，在宗炳时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1] 韦宾. 汉魏六朝画论十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9: 190-198.
- [2] 韦宾. 宗炳出仕考[J]. 文艺研究, 2009(10): 146-150.
- [3] 宋书: 卷九十三 宗炳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4] 晋书: 卷九 帝纪第九孝武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晋书: 卷十 帝纪第十安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6] 晋书: 卷九十九 桓玄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宋书: 卷二 武帝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8] 南史: 卷七十五 宗少文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宋书: 卷五十一 宗室 刘道怜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0] 宋书: 卷九十三 周续之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1] 宋书: 卷三 武帝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2] 宋书: 卷九十三 戴颙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3] 宋书: 卷五 文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4] 宋书: 卷六十一 武三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5] 何尚之. 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M]// (梁)僧祐. 刘立夫, 魏建中, 胡勇, 译注. 弘明集: 卷十一.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6] 宋书: 卷九十三 龚祈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7] 陈舜俞. 庐山记十八贤传篇第五·南阳宗炳[M]// 慧远. 庐山慧远大师文集(附录). 张景岗, 点校.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 [18] 宋书: 卷六十六 王敬弘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9] 志磐. 佛祖统记·十八贤传: 卷二十六[M]// 慧

- 远. 庐山慧远大师文集(传记文献). 张景岗, 点校.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259.
- [20]陈舜俞. 庐山记·十八贤传[M]// 慧远. 张景岗, 点校. 庐山慧远大师文集(附录).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347.
- [21]严可均. 全宋文: 卷二十 宗炳条目[M]// 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 总集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2]宋书: 卷五十一 临川王道规传(附江夏王义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3]张彦远. 法书要录: 卷一[M]. 范祥雍, 点校.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 [24]宋书: 卷三十九、四十 百官上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1321-1371.
- [25]杜佑. 通典·职官: 卷第三十七 职官十九宋官品[M]. 王文锦,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007-1008.
- [26]阎步克.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 [27]程树德. 论语集释[M]. 程俊英, 蒋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28]郑氏, 注. 孔颖达, 疏. 礼记·正义: 卷第五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M]// (清)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29]徐冲.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30]周文俊. 南朝官职拜除考述[M]//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三十八辑. 武汉大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31]晋书: 卷八四 殷仲堪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2]宋书: 卷九十三 雷次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33]宋书: 卷六十六 王敬弘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34]宋书: 卷五 文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35]宋书: 卷九十三 宗彧之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36]南史: 卷七十三 师觉授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7]南齐书: 卷五四 宗测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责任编辑 刘红娟】

## Zong Bing's Lifelong Absence from Official Position: Also on "Zong Bing's Theory of Becoming An Official"

HUANG Fayu

**Abstract:** Zong Bing, a painter, calligrapher, Buddhist thinker and originator of landscape painting theory,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rt and Chinese aesthetic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 Zong family was one of the best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Jingzhou at that time. His grandfather, father and brother were official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ong Bing had superior conditions and many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an official. However, he regarded the crown as autumn grass all his life, wandered between mountains and rivers, devoted himself to Buddhism, and successively lived in seclusion in Jiangling, Lushan Mountain and Hengshan Mountain. He is a famous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hermits in Chinese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Zong Bing was recruited nine times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local officials, and his official position and grade were higher and higher, but he always refused to be an official, reflecting the noble character of a true hermit who was independent and detached from vulgarity, and finally became an artistic model and spiritual idol worshipped and admired by ancient scholars of letters. There are occasional records of the title Zong Bing's official position in history. Some scholars mistakenly read that Zong Bing once served as an official. The conclusion of this misreading has not only changed Zong Bing's historical image, but also had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Zong Bi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Keywords:** Zong Bing; recluse; enlistment; obsence from official position; become an official; theory of painting; Buddhism